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师生学习、研究中共十七大精神论文集

马钦荣 刘永章 主编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师生学习、研究中共十七大精神论文集

马钦荣 刘永章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师生学习、研究中共十七大精神论文集/马钦荣,刘永章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642-0256-9/F·0256

I. 中… II. ①马… ②刘… I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理论研究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408 号

☐ 责任编辑 朱静怡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师生学习、研究中共十七大精神论文集

马钦荣 刘永章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上海远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装订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960mm 1/16 16.5 印张 287 千字

印数:001—500 定价:40.00 元

本书编委会

主 任

马钦荣 刘永章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干春晖	刘志远	何玉长
张 雄	郑少华	程 霖

提高教学质量 推动知识创新(代序)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马钦荣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第八部分关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提出了五个“有所”，即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并在该部分第一条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在“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条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并系统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大方针政策，涉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十七大报告还把教育事业发展放在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考虑，除了在社会建设部分集中讲了教育问题以外，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部分也都对教育作了相关阐述。特别在关于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中，都对教育事业提出了相应要求。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对我们教育战线工作的同志既是一种鼓舞，也是一种鞭策。在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联系高校实际，我们应当深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二是高校如何在国家的知识创新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本文为作者在2008年3月15日上海财经大学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精神”培训班上演讲报告的整理稿。

一、关于人才培养问题

人才培养问题,即如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问题。

现在的一个热门口号是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但是对“什么样的学生是高质量的学生”这一问题,不同的人看法也不一致。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学校教育工作者对在校生往往以知识作为本位,以卷面成绩来判定质量高低。同时,教师们总是希望学生能够在离开学校后走得更稳、做得更好、学得更多。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说法。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那我们所希望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党章明确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够担负起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的责任,能接这个班。这样的人才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应该说,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有培养人才的任务,而其中大学受到的关注程度最高。因为大学培养的学生学历最高,而且大学生从社会财富中受益最多,享受的社会公共财产最多,所以他们的社会责任就大些。目前,人们往往质疑今天的大学生将来能否在真正意义上承担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责任。与此相关,目前社会对大学的关注也较高、批评也较多,大学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不能把大学的所有问题的原因都归结在大学教育上,有的问题如不会去掉蛋壳吃煮鸡蛋,恐怕不是大学教育造成的吧?另一方面,大学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大学必须面对社会给予大学的种种压力。因此,大学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帮助他们完成从学校走向社会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要把“毛坯”加工为“成品”,这项工作相当重要。

大学生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应具备做人最基本的素养。但应该看到,这方面的教育或多或少还有点问题。在大学人文教育中,我们对学生讲了很多知识;教学生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也讲了很多,但存在脱节的现象。人文教育并不单纯是知识传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让学生拥有人文知识的同时,富有人文精神。有时候,学生人文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是很丰富的,去参加政治、法律、道德等课程的考试,卷面成绩会很好,但在

如何做人方面他们不一定做得好。知识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较为外在的,如物理、化学知识,人们掌握了就掌握了;另一类是较为内在的,是需要人们自我构建的,如关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知识,是需要经过体验来把握的。外在的知识可能是越发展越新,当代学生掌握的数理化知识可能比古代科学家还多,但是对人生、价值问题的看法,一些现代人未必比古人高明。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生、价值的看法已经相当深刻,这是经历人生体验而形成的。所以我们在进行这方面教育的时候,要引导学生去践行,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要让人文知识在他们身上内化,从内在接受,将人文知识转化为人文精神,而不只是会背一些条条。

从用人单位来说,它们对人才质量常提出以下四点要求:一是专业,业务要精,专业水平要高;二是敬业,做事要踏实、负责;三是忠诚,要有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要有诚信;四是包容,要有团队合作精神。这些要求对于我们的育人工作富有启发意义。

在说到人才强国时,我们常说到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大学在培养专业人才时,要思考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和社会发展。目前的环境变化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这也影响到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因而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产业结构变化,对专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要求就会发生变化;增长方式变化,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会发生变化。人才培养必须顺应新变化、新要求。为此,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管理制度方面都要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改革。必修课设置必须服从刚性的要求,即从培养目标出发,设计必修课。要办一个专业就要根据培养目标要求来开设必修课。这些课程,不管有没有现成的老师都必须开设。没有老师就请人来教,或请自己的老师进修后转行去教。选修课可根据教师的专长开设,有一定的自由度。要培养好学生,就要迁就培养目标,迁就这个目标决定的课程体系结构。师资队伍的建设也必须服从这一目标。教学改革要有一些物化的结果,如建成一些课程,出版一些教材,建立一些规范。在教学管理中,我们已做了很多改革,但能不能有进一步突破,如在学生的学分方面,学校对拿到全国“挑战杯”奖项的同学、对发表科研成果的学生能不能给予一定的学分?我们要扎扎实实推进这样的教学改革。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现在一流的生源特别是本科生源进入了上海财经大学,这点很值得我们自豪。那么,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学

生是否也是一流的,能否成为一流的人才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将更自豪。

大学在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时,会特别关注高端人才的培养。我们常说要培养高端人才,高端人才有这么几类:一是在学术专业领域有成就的学者,培养出最优秀的专业人才是研究型大学最主要的特征,北大、清华为什么自豪?因为它们的毕业生中院士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多。二是行业中的领军人物,在行业中工作做得最出色。上述两类一类是学问做得最好的,是专家;另一类是实践做得最好的,是行家。三是担负特殊社会责任的人,即领袖人物。社会评价学校是否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常常是看其培养了多少最有影响力的学问家、科学家,多少行业中的领军人物,又有多少毕业生担当了国家和地方的重任。在培养工作中不能只考虑学生的就业能力。当然,提高就业能力肯定要抓,而且这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优势。同时要针对一些特殊的人才有一些特殊的做法。这说起来容易恐怕做起来难,但作为拥有一流生源的学校,这一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至少在本科和部分研究生专业应当如此,要有一些针对拔尖学生的特殊措施。当然,人才培养不可能立竿见影,常常要在毕业十年以后甚者更长的时间来观察毕业生的质量,因为他们有一个慢慢成长、成熟、成型的过程。

要通过培养使一些学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所有学生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现实的。我们希望学生都成为奉公守法的公民,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培养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浅薄地理解为能讲一些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句子。如果不知如何去做、去实现,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有片面性,容易僵化、动摇。我们要培养的是能真正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内涵、坚信马克思主义又能与时俱进的人。这些人也要有真才实学,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

二、关于知识创新问题

大学是国家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是知识创新的核心。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和这个国家大学的素质相关的,这种相关性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相关,而是总体而言的相关。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历史,都印证了这种相关性。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观念创新、文化创新等任何一个角度看,现代大学都是社会创新的源头之一。这是大学非

常重要的社会功能,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力的强或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或小,国家前景的好或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就凸显了大学的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它不仅包括对学生的培养,还包括师资等人才队伍的建设。

作为社会的知识权威和伦理权威,大学应该用知识与道德影响社会,特别是影响在其中受教育的学生,而他们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所以在知识创新体系中,大学的作用是非常特殊的,它要培养有德性的专业人才。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各种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可以说大学承载着一种历史任务,即依靠其巨大的知识优势、人才优势来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型人才,提供巨大的智力支持。据统计,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分别有 63% 和 36% 在大学,两院院士也有近 40% 在大学;近五年,我国大学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分别占总量的 55%、64% 和 54%,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社会科学奖约占 80%。从数据可以看出,大学已成为我国知识创新的主体。

鉴于大学的人才优势、学科优势,高校自身已经意识到它不只是进行知识的传承,还承担着知识创新的职责。因此,知识创新既是大学外在的也是内在的要求。一些高端科学家、学问家,自身都在追求新的知识,不断探索新生事物,学校也有此义务和责任。在追求知识创新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一些知识并不是市场最急需的,并不产生直接的物质利益,但它们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却起着很大作用。我们不能放弃对这类知识和文化的追求,对于从事这类工作的专业人员需要给予很好的保护。虽然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科和专业应用类的比较多,但从精神层面讲,大学应该有这种精神,不能只是去追求一时的、轰动性的社会和市场效应,大学更要追求持久的、长远的、发挥深层作用的文化和精神。

在进行科学研究、推进知识创新时,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思想观念、公共政策、外交战略方面,往往是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动者。就是说,大学在进行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时必须考虑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能对国家重大决策、社会思潮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高校科研工作要对接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对接社会的需求。现在讲的民生问题、国计问题,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和老百姓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都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我校作为一个以经济管理学科为特色的院校,国家很需要我们为经济、社会、

政治、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要主动对接国家需求,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我校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不够,尤其是真正产生重大影响成果仍较少。

二要依托国家重大的人才计划、科研项目、建设项目、重点学科、重点科研基地,加强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这些方面,要促进领军人物、学术团队、学科建设三位一体的联动,即领军人物要能带出一个团队,团队要能把一个学科或一个基地建立和带动起来。选拔干部时讲实绩,评价人才时要凭成果。离开了成果,很难评价一个专业人才。同时,跨学科、跨部门的科研攻关在我们学校需特别提倡。我们的学科,特别是一些传统优势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搞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往往都是由一个团队完成的,个人离开了团队往往是一事无成。而我校在一些学科的确是搞出了一些富有个性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由个人完成。我们并不排斥个人的研究,但真正意义上对社会、国家战略有重大影响的、对某一重大问题有发言权的成果一定要依靠团队才能形成。我们应逐渐形成一种团队协作的风气,要依托于人才计划、基地建设和重大项目将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模式带动起来。这里强调的创新也包括组织机构方面的创新。

三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从总体上来讲,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我校是花了力气去推动的,也有进展,但在与名校的交流方面、在高水平的项目合作方面有点力不从心,因为缺少合适的渠道和合作对象。如果搞得好,我校是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的。国际交流合作应从基层做起,如“三个一”培养研究生,即派遣一流的学生到国外一流的大学师从一流的国际学者,在这方面,各院系经过努力,今年公派留学生数量有所增加,派遣学校层次上也有所提高。但校内教师、科研人员与国外学者交流还不够。要建设一流学科一个重要条件是学校一流学者能和国内外一流学者对话,需要通过各种有效的合作交流来推动学科建设,得到学界认同。与国外高校的交流合作一般是由下而上,即先是学者间的交流合作,然后是学院(系)间的交流合作,再到学校层面的交流合作。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有助于拓宽视野,有助于知识创新。

四要鼓励探索、鼓励创新。从事科学研究,不是课题申请到了、经费拿了就结束了,还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进行研究,让项目成果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科学研究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忽悠,不要造假,不要只是作秀或是炒作。现在,有些研究看上去有一个个高潮,最后却没有成果,把研究搞成脉冲式的造势,不是扎扎实实的去做。创新要立足

于扎实的基础,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不是翻烧饼似的今天翻过来明天翻过去。而如果真是认真研究了,却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这应当是允许的。

五要具有特色。通常,左右一个学校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有几个因素:第一是社会需求,第二是学科发展的前沿,第三是学校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现状。前两个因素各学校基本相同,如经济学科,兄弟院校和我校遇到的是同样的国际、国内前沿问题、同样的社会需求。关键是学校的历史传统文化、现状条件如何。学校只能在此基础上抓学科建设、搞知识创新。离开了自己的特色、自身的条件是不行的。学校抓内涵建设不要照搬、照抄他人的做法,也不要寄希望一蹴而就。教育发展规律一定是积小变为大变,有深度有内涵的学校始终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

六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知识创新要特别抓好相关的体制机制建设。比如评奖制度,现在国家颁发的大奖,可以供一个获奖者享用一辈子,因此很多人都争着去拿这个奖。这是比较典型的终身制。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去争取,因为这是一种各高校间可以比较的指标。又如考核制度,很多人批评高校过于注重考核。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考核,而是如何考核。指标应当尽可能向学界公认的评价标准靠拢,边界要明确。对一些特殊人群要有特殊的考核方法。一旦考核办法定下来,修改要有程序,以避免随意性。现在人们对大学教师考核方法有意见的比较多,其实对机关、服务部门的考核也应科学化,以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和知识创新工作。所以,要搞好知识创新,体制机制问题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目 录

1	关于经济改革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叶正茂
14	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突破与创新(1978—2008)	冒佩华
21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财税发展	胡怡建
27	浅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刘志远
35	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途径	洪登永
45	劳资利益关系协调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马 艳 周扬波
61	浅析财产性收入	汪 晨
69	对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的思考	常 宁
74	新农村建设要着力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张 力
82	长三角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张锦华
91	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理论思考	豆建民
100	论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发展	史红亮
113	上海社区商业的发展模式研究	何 骏
121	着力改善民生 注重社会建设	何玉长
128	城市住宅需求与户籍制度刍议	应勤俭
135	构建和谐社会与解决农民工问题	陈晓和 靳子畅
145	法治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	李 宝

160	改革创新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之魂	刘庆生
164	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提高反腐倡廉成效	毛荣生
169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做好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	王青云
176	加强高校机关党内和谐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徐 萍 潘橙璋
189	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和谐发展的能力探索	陈红梅 周 巧
200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	余绘平
207	推进我校和谐校园建设的对策思路	应望江
218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若干思考	叶 朱
224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学校图书馆事业新发展	陈 骁
232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陈启杰
239	高校内设医疗机构现状和发展的思考	何 敏 戈 甲 沈卫明
247	后 记	

关于经济改革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 叶正茂

一、经济改革的历程是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经济改革的本质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中国经济改革的二十多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农民受利益驱动进行制度创新,实现了农村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是由农民首先拉开的,早在1978年前后,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和天长县的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状况,首先打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探索出包产到组和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负责人的办法,开始打破“人民公社制”的坚冰。之后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这些由农民受利益驱动而自发地展开的、在当时还是完全非法的诱致性变迁——“包产到户责任制”,刚开始受到了旧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但是在这个新的制度安排所创造出的巨大利益面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得到了体现。来自安徽、四川等省社会基层组织的行为,反映了新体制的利益大于人们为此而冒的风险,因而人们自发地开始了创新的过程。

农村之所以成为我国制度变迁的突破点,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实现的是集体经济,旧体制对农民而言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从就业到住房再到医疗、子女教育等等,农民从来就是依靠自己来解决,因此对旧体制的依赖程度很低,相应地对旧体制创新的成本较低,制度变迁也就容易实行;另一方面,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农民在旧体制中是受压抑最重的利益主体,不但受到农业经营机制本身的束缚,也受到诸如工农业剪刀差之类的其他制度

安排和整个制度环境对其的束缚,因而新的体制对农村而言利益是巨大的。在这样的成本—收益对比之下,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的利益主体寻求体制变更的冲动也就最强烈,他们一旦发现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进行的组织制度创新可以以较少的代价(成本)带来传统体制下无法取得的巨大收益时,就会甘冒风险,从而导致农村整个经营形式的制度变迁。

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2年,受农村改革成功的推动,城市特别是国有企业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也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只不过是到1983年以后才成为重点问题凸现出来。从经济利益关系的逻辑出发,我国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放权让利。针对传统体制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缺乏活力的问题,一项急迫的改革举措就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直接向企业放权,这种关系调整的突破口在分配环节上就是国家向企业的“让利”。从否定企业的独立利益存在到承认并尊重企业拥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形成对企业的强烈地刺激,从而“唤醒”企业理性,使其成为能动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必然带来整个经济的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整个改革的不断深化创造出更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和良性循环的诱导力量。企业改革首先是以扩权试点为突破口,着重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主要内容是扩权、减税、让利,使企业拥有一定的自主财产和经营权力。其次是试行经济责任制。所谓经济责任制,就是指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把经济责任、经济权力、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综合性管理制度。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和推动下逐渐完善起来的。第三是实行利改税。实行利改税是解决国家和企业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新方法,它通过设置税种和税率来进一步把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下来,又使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利益激励机制,进行内部的强化管理,增加产出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留成。第四是全面推行承包制。国家肯定企业局部利益存在,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种改革推进的势头必然造成如下局面:一方面,国家向企业让利,并且每一种具体形式的变化更替,都伴随着企业千方百计保住既得利益,国家财政收入在企业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经济有所增长的同时却逐年减少;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资金增加,改革的配套措施展开也需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成本,这样都表现为财政开支的逐年增加。显然,这种收支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是难以为继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承包制成为企业经营方式的最主要的形式,承包制总的原则是包死基

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通过承包这种办法,围绕企业盈利这一核心,以契约的法律形式来界定和稳定国家与企业之间责权利关系,制止国家财政收入“滑坡”,从而稳定国民经济、稳定改革进程。实践证明,与利润留成和利改税做法相比,承包制的可行性较强,承包合同由企业与主管部门商谈后确定,便于操作。而且,承包制在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分配上与利改税相衔接,即双方既得利益变动不大,企业改革保持了渐进性和连贯性。

以上四个步骤统称为放权让利的改革。然而,放权让利的改革面临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在经营者方面缺少来自所有者的约束。企业扩权以后,“拼设备”、“多分少留”、不注重技术改造和长期发展的短期化行为相当普遍,缺乏谨慎态度的投资扩张行为有增无减,通过种种方式(贿赂、有意低估国有资产、挥霍性消费等)“吃”国有资产的行为,在有些地方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这样,便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放权悖论”的现象:不放权经营者缺乏积极性;放了权经营者又缺少约束,产生了盲目追求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的倾向。

第三阶段是从1992年至今,属于制度环境的变迁和制度创新阶段,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利益关系得到重新调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改革进入了全面的制度创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改革由过去主要突破旧体制到建立新体制,由政策调整转到制度创新,由单项改革转到整个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的变革。制度环境发生的突破性变革,为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与创新腾出了广阔的空间,在新制度利益不断释放的前提下,也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有了进一步的制度保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一种局部性的利益调整,而是涉及整个制度结构的全局性利益调整。在此过程中,一些既得利益将受到冲击,同时,也将形成一些新的利益主体,有较大的利益转移现象。具体地说,利益关系调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从政府方面看,国家或中央政府作为一个利益总体,宏观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富裕。(2)从行政管理部门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其利益关系的调整,影响更是重大。原先的综合管理部门的实际权限(各种审批权限)将逐步削弱,原先的主管部门被逐步取消或转变为行业性管理。这些属于权力转移的利益关系调整,其既得利益是受冲击的。(3)从企业经营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所要构造的是面向市场的法人治理结构,会削弱原有的经营者在以往企业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内部控制权,形成对其既得利益

的冲击。但将彻底改变经营者低报酬的局面,这对经营者来说则是一种新的利益来源。因此,企业经营者在利益调整中将有得有失,关键是新制度出现所提供的收益是否足够用于补偿损失。(4)从企业职工来看,新制度出现对其利益关系的调整,其影响程度不等,分布也不均匀。(5)产生了一批新的利益主体,乡镇企业是最早从计划经济框架中浮现出来的新兴的利益主体,中外合资企业更是纯粹意义上新兴的利益主体,私营企业是又一个新的利益主体。

总之,改革以来,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原有利益主体的运行特性被改造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原本并不清晰的利益主体被激活了,同时引进和萌生了一批原体制以外的全新主体,这些发展变化贯穿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

二、经济改革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通过对经济改革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是采取渐进式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样,在有序地构建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尽管存在国有企业尚未摆脱困境,生态环境损害较大和贪污、腐败现象等问题,但经济改革的收益明显超过成本。事实也已表明这一方式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具体表现如下。

(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1.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4 772亿元,为1978年3 624亿元的20多倍。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高于1952—1978年年均增长率3.7个百分点,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年均2.5%和发展中国家年均5%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2. 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据世界银行统计,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7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79元提高到1997年的6 079元。到1995年,我国已提前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3. 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农业改变了长期徘徊的状态,保持稳定发展。1979—1997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5%。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1979—1997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工业年均增长12%。在工业内部,从1980年起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扭转了盲目